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 golden-brown color scheme. In the upper hal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visible, winding across the landscap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t the top. In the lower left foreground, a large, detailed bronze lion statue (shishi) is depicted, facing right. The lion has a fierce expression, with its mouth slightly open, showing its tongue and teeth. It is adorned with intricate carvings and a collar.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historical and majestic.

ZHONGGUO
QUANSHI

中国全史

[卷七]

远方出版社

全案策划：大 地
封面设计：福瑞来



ISBN 7-80595-975-7



9 787805 959757 >

ISBN 7-80595-975-7/K·27

全套定价：1280.00元（全48卷）

中国全史

主编 程思源

通史 卷七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丽娟

中国全史(通史卷)

主 编:程思源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900 千字

印 张:338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80595-975-7/K·27

定 价:1280.00 元(全 48 卷)

庞勋起义

裘甫起义爆发的江浙地区，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表面化。地方官吏贪暴如前，下层百姓困苦如故，数万游民“爪牙乍敛，睥睨人间”，流散于江淮，特别是青徐之间，把危机和动荡辐射到更广泛的地区。

淮南的青徐地区，是江淮漕运的通道和咽喉，是唐王朝统治的重心之一。这里百姓与官吏之间、士兵与将帅之间，方镇与方镇之间，方镇与中央之间矛盾重重，其中尤以士卒与将帅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从中唐以来，徐州兵变不断，徐州军士素以骄悍难治闻名天下。

咸通三年（862年）七月，前徐州节度使王智兴的亲兵银刀军又发动了一次兵变，逐走了新任主帅温璋，引起唐王朝的很大震动。唐廷深恐这里的局势会演变为新的割据，下决心彻底解决徐州问题，因而派出王式前往镇压。素以凶狠闻名的王式率领忠武、义成两镇兵马赶到徐州，随即大开杀戒，将参与哗变的数千人尽数诛戮。深怀疑惧的唐政府又采取离而散之的办法解决徐州问题，将徐州驻节军将由节度使降为团练使（后又改为观察使），隶属兖海节度使。原徐州兵卒除三千留守外，其余皆分散诸镇，因此有不少徐镇兵士散落在民间或“潜匿山泽”，成为唐王朝的一大隐患。

在内忧重重的同时，唐王朝的外患也日益加重，边疆形势日益紧张。在周边各族中，最使唐王朝棘手的是南诏。通过与内地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九世纪初，南诏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

展，国力的增强也助长了南诏统治者的掠夺野心。宣宗大中末年，唐边将贪婪刻薄，激化民族矛盾，致使唐与南诏战事再起。从此南诏连年进扰，仅在咸通一朝，南诏就曾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掠夺了大量人口和财物。直到875年，唐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才将南诏军驱过大渡河，收复所失州县。唐王朝也由此国力大衰，一蹶不振。数十年征战，天下征兵运粮不断，租赋大半不入京师，府库空竭，政府入不敷出，“有司远取后年乃济”，将士死于瘴疠，百姓因为“盗贼”。

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实行了一项“两全”之策，从咸通四年开始数次下诏，以徐州“土风雄劲，甲士精强，比因罢节，颇多逃匿”为由，多次在徐州一带募兵往戍岭南。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解决对南诏用兵的需要，同时也在尽量消弭徐州一带有碍稳定的因素。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唐王朝所期望的那样美妙，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而拆东墙补西墙，其结果无异于抽刀断水。对徐州问题的处置失当直接导致了徐宿地区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咸通四年（863年），徐泗兵卒八百人戍守桂州（今桂林），约定三年一换。在岭南，士卒们饱受瘴疠、饥饿、战乱之苦，直到咸通九年（868年），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仍不肯发兵更代，从而激起了戍兵的愤怒。他们杀死都将，推粮料判官庞勋做首领，结队北还。他们沿途招纳银刀亡卒，避开唐军，利用地方割据的有利形势，绕道而行，出湖南，沿江东下，过浙西，进淮南，九月顺利抵达徐州境内。

庞勋等戍卒“擅归”，本还过是“思见妻子耳”，唐王朝最初也按一般军变进行了处理，派遣宦官赦免其杀将擅还之罪。而唐

地方守将更是首鼠两端，只求保境自安，息事宁人，淮南节度使令狐綯就曾公开表示：“彼在淮南不为暴，听其自过，余非吾事也。”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唐王朝的意料，戍卒们到达徐州后，听说有“密敕”下达，只等他们一到家乡，便“支分灭族”，于是庞勋向部下宣布：“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为天下笑，曷若戮力同心，赴蹈汤火”。在徐州城南，他们击败了崔彦曾的截击，南下攻克宿州（安徽宿县）。当时淮北正值水灾，农民苦于重赋搜刮。庞勋等在宿州开仓赈济贫民，于是“一日之中，四远云集”。大量农民参加到庞勋的队伍里，使这次兵变性质的武装斗争转变为农民起义。

农民军纪律良好，无所侵扰，在运河线上打败官军，乘势向北包围并攻克了徐州，势力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了两淮的广大地区，切断了江淮通往长安的航运线，造成了极大的声势。

江淮运输的断绝，对早已虚弱不堪的唐王朝无异于釜底抽薪，引起朝野极大震动。为了扭转局面，唐政府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方面调集各路大军，准备镇压，另一方面又利用庞勋等人的幻想，大加抚慰，以争取时间。而以庞勋为代表的起义上层领导者，却未能从根本上摆脱“骄兵”的本性，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反映农民要求的纲领，从而使这次起义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受影响。在取得暂时胜利之后便“自谓无敌于天下”，骄奢日甚，军纪弛坏，他们念念不忘王智兴的“故事”，一直把获得朝廷的节钺作为斗争的最高目标，多次向唐王朝“求节钺”、“赐旌节”，幻想割据一方。当朝廷派康道伟带着敕书前往“抚慰”时，庞勋一面大陈甲兵三十里，一面亲自郊迎，作求节钺表，淮南节度使令狐綯遭到义军进攻，表示“许为奏节钺”，

庞勋于是“息兵俟命”，给唐军以“收散卒，修守备”的机会。

“抚”的一手为唐王朝赢得了时间，为“剿”作好了准备，随即派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任义成节度使兼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率义成、魏博等十镇兵，合沙陀、吐谷浑、达靼、契丹等部落兵，共二十万之众前往进剿。咸通十年（869年），起义军连战不利，在唐军四面包围之下，原先攻占的地区相继失守，唐兵进逼徐州。在紧张的形势下，庞勋接受部下的建议，引兵西攻宋州，力图牵制唐兵，但当庞勋西行后，其部下宿州守将张玄稔等相继降唐，并引唐兵围攻徐州，守将许佶、庞举直等战死，庞勋西攻宋州不克，转攻亳州，准备折回徐州，却为沙陀骑兵所追击，在蕲县附近被优势的唐军包围，庞勋与起义军近万人战死，余部散落到兖、青、郛、齐各地。时在咸通十年（869年）九月，起义经历了一年零两个月，至此归于失败。

懿宗一朝，唐王朝就是这样对于各种形式的人民反抗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方针。剿灭是其根本目的，而抚慰不过是剿灭的辅助手段，统治者只是以此赢得镇压的时间，而从未试图通过“抚慰”缓和社会矛盾，革除弊政。通过血腥的高压，唐王朝如履薄冰地度过了十几个春秋。然而高压的结果只能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表面的平静孕育着更深刻的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唐王朝正沿着一条覆灭的道路沉落、下滑。

冲天大将军黄巢

唐朝末期，经过藩镇混战、宦官专权和朝廷官员中的朋党争吵，朝政越来越混乱。唐宣宗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皇帝，也没

有能改变这个局面。到了唐宣宗死后，先后接替皇位的唐懿宗李漼、僖宗李儇一味寻欢作乐，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更是腐朽到了极点。皇室、官僚和地主加紧对农民的剥削，税收越来越重；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农民纷纷破产，到处逃亡。有的忍受不了苦难，只有走上反抗这条路了。

唐懿宗即位那年，浙东地区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队伍从一百人发展到三万，坚持斗争八个月，震动了整个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

过了八年，驻守在桂林的八百名兵士（大多是徐州一带的农民），因为驻防期满，上司一再延期不让他们换防。他们杀了军官，推庞勋为首领，发动起义。他们从桂林向北进攻，打回老家，沿路和徐州附近农民纷纷响应，到了徐州，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

这两次起义都被朝廷镇压下去。但是，百姓反抗的情绪越来越高，新的起义的规模也更大。

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农民，为了逃避官税，就靠贩私盐挣钱，但贩私盐是很危险的，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日子一久，就结成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些首领，有的后来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德宗即位那一年，濮州（治所在今河南南范县）地方有个盐贩首领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长垣（在今河南）起义。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号召很快得到贫苦农民的响应。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地方的盐贩黄巢也起兵响

应。

黄巢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他在长安看到唐朝廷的腐败和黑暗，心里十分气愤。据说，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一首咏《菊花》的诗，用菊花作比喻，表示他推翻唐王朝的决心。诗中说：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汇合之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接连攻下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唐王朝非常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

唐王朝硬的一套不行，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蕲州（今湖北蕲春）的时候，他们派宦官到蕲州见王仙芝，封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得有官做，迷了心窍，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黄巢得知这个消息，气极了。他带了一群起义将士，到王仙芝那里，狠狠地责备王仙芝，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我们弟兄往哪里去？”

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脑地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满脸是血。旁边起义将士也你一言，我一语骂王仙芝。王仙芝知道自己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赶跑。

经过这番波折，黄巢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黄巢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在今湖北）

被唐军打败，他本人也被杀死。

王仙芝失败后，起义军重新会合，大家推黄巢为王，又称冲天大将军。

当时，官军在中原地区力量比较强，起义军进攻河南的时候，唐王朝在洛阳附近集中大批兵力准备围攻。黄巢看出敌人企图，决定选择官军兵力薄弱的地区，带兵南下。他们顺利渡过长江，打进浙东。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越州、衢州（今浙江衢县）；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今福建建瓯）的七百里山路。经过一年多的长征，一直打到广州。

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以后，岭南地区发生瘟疫。黄巢决定带兵北上。唐王朝命令荆南节度使王铎、淮南节度使高骈集合大批官军沿路拦截，被黄巢起义军一个个击破。起义大军顺利地渡过长江，吓得高骈推说得了中风症，躲避扬州城不敢应战。

起义军渡过淮河，向官军将领发出檄文，说：“我们进攻京城，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的事。你们各守各的地界，不要触犯我们的锋芒！”

各地将领接到檄文，害怕起义军，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为唐王朝卖命。消息传到长安，唐僖宗吓得朝着大臣哭哭啼啼。

公元880年，黄巢带领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过潼关。潼关周围满山遍野，飘扬着起义军洁白的大旗，一眼望不到边。守潼关的官军还想顽抗。黄巢亲自到阵前督战，将士们见了，一齐欢呼，声音在山谷间回响，震天动地。官军将士听了心惊胆战，哪敢抵抗，纷纷烧掉营寨，四下逃命。

起义军攻下潼关，唐王朝惊慌失措，唐僖宗和宦官头子田令孜带着妃子，逃到成都去了，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

降。

当天下午，黄巢坐着金色轿子，在将士的簇拥下，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起义军大将尚让当场向大家宣布说：“黄王起兵，本来是为了百姓，不会像姓李的（指唐朝皇帝）那样虐待你们，你们可以安居乐业了。”兵士们看到人群里的贫苦百姓，就把自己得到的财物散发给他们。

过了几天，黄巢在长安大明宫即位称皇帝，国号大齐。起义军经过七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但是，黄巢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占领过的地方，都没留兵防守。几十万起义军进入长安以后，四周还是官军势力。没有多久，唐王朝调集各路兵马，包围长安。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

黄巢派出大将朱温驻守同州（今陕西大荔）。但是在起义军最困难的时候，朱温竟投降了唐朝，做了可耻的叛徒。

唐王朝又召来了沙陀（古代西北少数民族）贵族、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四万骑兵进攻长安。起义军十五万迎战，遭到大败，只好撤出长安。

黄巢带领起义军撤退到河南，又遭到朱温、李克用的围攻。公元 884 年，黄巢在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失败之后，受到官军紧紧追赶，最后，退到泰山狼虎谷，英勇牺牲。

官修五代史

唐立国之初，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他的建议得到高祖李渊的批准，当时就选五品以上

官员子孙工书法者为书手，缮写购来的经籍。其后，魏征、颜师古继续收集、缮写典章图籍，这些工作为唐初大规模修史提供了文献上的准备。

武德四年（621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高祖李渊提出修撰近代梁、陈、北齐、北周、隋等朝正史，李渊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年的十二月下《命肖瑀等修六代史诏》，任命中书令肖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撰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撰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撰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肖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征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历时数年，未能成书。

太宗即位后，非常重视修撰前代史书，总结历史经验，他认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下诏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令狐德棻主编《周书》；由有家学传统的史家姚思廉、李百药分别主撰《梁书》、《陈书》及《北齐书》。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的帝纪列传及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魏征还亲自为梁、陈、齐史撰写了总论，为《隋史》写了序论。这五部史书合称“五代史”，或“五代纪传”。贞观十五年（641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五代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监修，永徽三年（652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6年）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后编入《隋书》。

《周书》，令狐德棻主编，同修此书的还有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庾俭。岑文本是唐初著名文士，《周书》中的史论多出

自其手。《周书》记述了从五三四年东、西魏分裂至五一八年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唐以前，有西魏史官柳虬所写的官史，还有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令狐德棻等即是在前代所修史及唐初征集的家状之类资料的基础上撰修的。宋初，《周书》已经残缺，后人用《北史》及唐人史钞补之。流传的最早的版本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版的“三朝本”。《周书》共五十卷，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

《北齐书》，李百药撰。北齐史的修撰，从高齐政权时代起直至隋朝的五十年间，一直未间断，曾先后有人编写出几种不同体裁的北齐史，例如：隋代李德林纪传体的《齐书》二十四卷，王劭编年体的《齐志》二十卷。刘知几《史通》中记，高齐时有陆元规记述刘文宣帝征伐的《皇帝实录》，武平年（570—575年）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直至齐灭。李百药奉诏写北齐史，主要是在其父李德林《齐书》的基础上，参考王劭的《齐志》，扩充改写而成。李德林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一直担任诏令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北齐时，他参加了《国史》的编写，撰出纪传二十四卷，隋开皇初，又奉诏续撰，增至三十八卷，可以说北齐史已粗具规模。贞观十年，李百药承其家学而完成了《北齐书》五十卷，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两个割据政权的兴亡史，从公元五三四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中经（550年）齐代东魏，至五七七年齐亡为止。《北齐书》早在唐中叶以后就逐渐残缺，也不断有人补缺，到北宋初就只有十七卷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都是后人以《北史》和唐人史钞中相关纪传补的，初次刻板即是补本。

《梁书》、《陈书》，姚思廉撰。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陈朝许亨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谢吴写成《梁书》四十九卷，陈代何之元和隋代刘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陈代的历史，傅縡、顾野王都曾受命编撰，陆琼著有《陈书》四十二卷。姚思廉的父亲姚察在陈初曾参与梁史的编撰，入隋后，又于开皇九年（589年）受命编撰梁陈两朝史。《隋书·经籍志》著录姚察曾撰有《梁书帝纪》七卷，《陈书》二卷。姚思廉正是继承父业，兼采众家来完成《梁》《陈》二书的。他曾说“《梁》《陈》二书本多是察之所撰”，尤其是《梁书》，其中大部分篇幅是姚察所撰。姚思廉在唐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受诏修撰两朝史，贞观十年完成。《梁书》五十六卷，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

《隋书》，魏征受诏总加撰定，参加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唐是继隋之后而建立的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唐初的统治阶级非常重视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唐太宗与大臣们一再反复研讨这一问题。魏征在主修《隋书》时，在撰写其中本纪之“后论”，志之“序”，列传之“后论”时，将修史与求治紧密结合了起来。贞观十年，《隋书》完成后，魏征还向太宗上了一封奏疏，集中阐发了他从隋朝兴亡史中总结出的治国之道。《隋书》先修成帝纪列传，后加入十志，无论纪传还是志，都成于众手，到宋初，所题撰修人姓名已很不一致，宋天圣二年（1024年）刊刻《隋书》时，纪传部分题魏征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隋书》八十五卷，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

自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下诏禁绝私撰史书，至唐朝，

官修史书即成定制。此后，所谓纪传体的正史大都由封建政府掌修，私家著述越来越少。宰相监修国史也成为此后历朝定制。

遣唐使来唐

公元六三〇年，日本舒明天皇派遣出以犬上三田耜为首的第一批遣唐使，他们于舒明四年（632年）循北线（从山东启航，途经朝鲜半岛）返回日本，唐使高表仁随船同行去日本。

孝德天皇于白雉四年（653年）组织遣唐使团，以吉士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使团还有入唐学生、学问僧以及船员、工匠、射手等一百二十一人，同乘一条船赴唐。同行的还有以高田根磨为大使的一百二十人遣唐使团，他们所乘之船在海上遇难，未能到达中国。吉士长丹等于第二年返回日本。继第一批两个使团之后，孝德天皇紧接着于白雉五年又任命高向玄理为押使，河边麻吕为大使，药师惠日为副使，组成遣唐使团，分乘两只大船赴唐，使团第二年返回日本。

齐明天皇时派遣过一次遣唐使，齐明五年（659年）出发，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分任大使、副使，分乘两船赴唐，其中一艘漂流失航遇难，另一艘沿北线到达，两年后返回日本。

天智天皇时期曾三次遣使来唐，但都不是正式的遣唐使团，其目的是为了礼送唐朝使节回国。

日本文武天皇时期及至孝廉天皇时期，正值唐王朝中宗、睿宗、玄宗极盛之时，日本为了学习、借鉴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扩大遣唐使团的规模，其组织也更严整有序，一般在押使或执节使下设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使团人员包括有知乘船

事、造船都匠、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生、船匠、挟抄等等，并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学问僧同行。

文武天皇于大宝元年（701年）正式组建遣唐使团，任命粟田真人为执节使，天皇举行仪式授其节刀，颁布诏书。又任命了大使、副使、判官等。大宝二年使团从日本筑紫出发，循南线（在我国长江入海口附近的苏州、明州登陆）来唐，随行有学问僧道慈等。庆云元年（704年）执节使返回日本，大使、副使因故数年后才返回日本。道慈在中国求法十七年，回日后成为日本三论宗第三代祖师，他按照唐长安西明寺的规模，在日本平城京修建了大安寺。

元正天皇于灵龟二年（716年）组建起庞大的遣唐使团，任命多治比县守为押使，颁赐节刀。另任命了大使、副使、大小判官、大小录事等，一行有五百五十七人之众，分乘四条大船，于养老元年（717年）从日本难波出发，沿南线来唐，使节于第二年返回日本。同行的学生吉备真备在长安学习经史达十八年之久，返日时带去《唐礼》一百三十卷，《太衍历经》一卷，还有测影铁尺、铜律管、射甲箭等。他与同行来唐的大和长冈在日本共同删定律令，并使我国僧一行创立的新历，于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768年）在日本实行。随使团来唐的学问僧玄昉，在唐研习法相宗十八年，返日时带走经论五千余卷，他后来成为日本法相宗第四代祖师。

圣武天皇于天平四年（732年）组织了五百九十四人的遣唐使团，任命多治比广成为大使，造船四艘，次年从难波出发来唐。天平六年（734年），使团的第一船返回日本，天平八年（736年），第二船到达日本。另外两艘船在中途遇难。随此团来